

疫情之下的公益冷思(上)



刘丽波/文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发展与校友事务中心总监

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国防治疫情成绩有目共睹。这得益于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动员能力、医务人员的奉献、物资保障充沛、民众自律以及社区联防联控。而公益慈善组织则通过组织捐款、捐助抗疫物资、组织志愿活动等多种方式,参与了抗疫的整个过程。

一、面对疫情,公益行业缺什么

灾难会让人性闪耀光芒,也会更加暴露人性中的丑恶。公众记住了志愿者、社会组织的抗疫事迹,也记住了那些不和谐的音符。本次疫情也公益组织也暴露出公益慈善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

公信力,依然是公益慈善的软肋。《公益时报》的调查显示,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满意度较低。作为一家“百年慈善老店”,如何解决透明、效率等问题,给公众以信心,发挥救死扶伤的使命,依然值得深思。

专业能力缺失、理性判断力不强,也是公益慈善组织面对抗疫暴露出的重大问题。面对疫情,仅凭一腔热情远远不够。在抗疫中,众多机构仓促上马,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比如捐赠

口罩、防护服等,既无渠道,又没有专业鉴别力。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忘记了自助助人的基本原则,在自身还没有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就直接面对病毒,结果有的志愿者也被感染,让人十分痛心。这暴露出日常公益慈善机构的自身建设、业务规划、应急处理等方面的问题。许多公益慈善机构,在创立之初,就是凭着一腔热情创立的,只强调使命、责任,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理性精神、专业能力、路径规划等。疫情让我们明白,使命不能替代专业,热情不能取代理性与科学。

有学者及业界人士反思,说之所以手忙脚乱,其原因在于缺乏应急机制,缺乏应对疫情的经验,这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在岁月静好的平日,公益机构在参与救助、运作项目时,难道就高效有序吗?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从根本上说,疫情考验的是平时的专业素养、管理能力,考验的是机构内部的整合能力,以及与政府、企业的沟通协调能力。

这一次抗疫过程中,公益行业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是统筹协调机制缺位,民间救灾整体缺乏预见性和科学准备;二是缺乏

顶层领导组织和能力,无法指导社会力量和企业有序参与;三是公益机构罕有预案准备、各行其是,行业联合与协同不足;四是除个别指定机构外,民间力量无法与政府部门开展高效协同;五是顾不上做需求调研和评估,项目“跟风”的现象依然严重……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与12年前汶川地震时相比,公益行业依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民间救灾机制,专业救灾能力亦未显著提升,因此,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未能发挥出期望中的作用。

通过反思,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在灾情之中,能对抗疫有所助益的,大多是平日专注在某个领域精耕细作、运作有序、内和外顺、协作有力的公益机构。它们的经验,昭示着行业发展的未来之路。

二、“和顺通专”,公益行业的必由之路

几千年的文明史显示,人类与灾难形影不离,而慈善与人类的苦难相伴相生。近现代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的风险系数更高,更容易发生局部乃至系统风险。因此,公益行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在应对系统性风险中,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但前提是,公益慈善行业要通过对抗疫的反思,找到自己的建设之路。

那么,公益慈善组织,应该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为或许还要发生的疫情乃至灾难做好准备呢?以笔者之见,需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一是“和”,即建设合作共赢、和而不同的内部环境。公益行业需要破除小圈子意识,要有合作共赢的胸怀。公益行业的基本出发点是解决社会问题,或扶

贫济困,或敬老爱幼,或教育教化,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与企业不同,因此不应强调竞争,而应看重合作共享,坚守共同目标,守望相助。

我国目前仅有85万家注册的社会组织,与上亿的市场主体相比,规模甚小。强调和合,就是要加强行业内的理念、信息共享,加强资源和行动等方面的链接,形成围绕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社会福祉的合力。这种“和”,是行业内部的和谐、和顺,要在依法开展慈善活动的基础上,形成行业秩序和规范,讲求慈善伦理;要有价值认同和理论支撑,形成行业文化。同时加强合作与交流,促进行业协作和专业化分工,更好发挥聚合作用。这是行业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

二是“顺”,即理顺关系,建设顺畅的外部环境。这是慈善机构作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解决社会问题、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是政府关系。在社会治理中,包括在重大疫情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在重大问题中,甘于当配角,善于当配角,用公益行业擅长的方式解决问题。其次是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是捐款的重要来源,也是参与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而企业的方式也是效率最高的。如何与企业合作,引导商业向善的同时坚守自身价值立场,保持独立性,这对公益机构乃至行业而言都是一门大学问。三是与社会的关系。公益行业立足于人心之善,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倡导公益理念和志愿精神,传播慈善文化。需建设良好的公众与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人心向善。

三是“通”。融会多学科知识和东西方思想,贯通慈善文化及精神内涵,在社会发展变化中明晰公益慈善的价值定位及其基本逻辑,才能知行合一、造福社会。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是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灾难还是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都需要第三部门的积极参与。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公益慈善行业要有广阔的视野和系统思维方式,要善于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一方面,在慈善理论构建上,要借助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贯通慈善之理;另一方面,要借助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及信息技术,探究“为善之术”,形成与公益慈善发展相适应的思维、行为方式。

四是“专”。专业是实现使命的基石。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没有专业精神、专业能力和专业人才,使命难以实现,甚至还会好心办坏事。这次疫情,也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专业精神的魅力。要专业,就必须要有专业人才,这是慈善行业专业性的基础。培养公益慈善专业人才,一方面要提高现有从业者的系统思维能力和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相关专业人才引入公益行业,将其培养成爱公益、懂公益的志愿者或专职公益人,使其在为社会服务中实现自身价值。

总之,所谓“和顺通专”,就是从公益行业的整体发展而言,理清其内外部关系,构建起基于社会价值的公益伦理和理论体系,形成能够指导公益实践和社会创新的思维方式,提升行业专业能力和整体水平,从而搭建起能够促进社会问题解决和公益生态完善的支撑体系。

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微谈

随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传统慈善”“现代公益”提法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传统的慈善如何演化为现代的公益?两者产生和存在的背景、基础有哪些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总的来说,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的存在背景都是社会均衡的需要,是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和手段。

传统慈善大多由宗族、个人主导,也偶有官员、政府鼓励支持,突出的是“济”,一方帮助另一方,面向宗族、乡里等特定人群居多。慈善行为的出发点大多是直接对人的关怀,不论是受儒家思想驱使,还是其他宗教教义使然,不论是义庄、义学,还是慈善堂、养病坊,都不具备公共化受益、普遍性济助、社会化动员等特点。如此形态

的经济背景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富余慈善,封闭分散基础上的局部慈善,宗族血缘基础上的乡里慈善,个人认同基础上的少数人的慈善。即使是以寺院等为依托的宗教性慈善,也是在当时宗教经济、政策基础上的副产品,遭遇“三武灭佛”或其他社会纷争,这种慈善也是变数频频、难以为继的;传统慈善的文化背景是以个人修为德性为认识基础,既不是社会共识,也不是责任义务,随意性、随机性因素较多,即使得到社会认同和赞许,也不是价值风尚形成的必要要件;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府不能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其政治的基点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慈善行为的普世价值受到限制,也不可能得到统治阶级的倾力

推动。

现代公益总的来讲是组织化进行的,得到政府的支持,突出的是“益”,是公共利益、共同好处,局部或个人帮助全局或集体,面向社会、全局中的弱势群体或需保护、需发展的公共事业。公益事业产生的出发点是通过影响社会持续均衡和谐发展的事物的关注与支持解决,而最终达到对人民福祉的关怀。不论是帮助弱势群体,还是关注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都能体现出利益共同性、对象普遍性、动员社会化等特点。如此形态的经济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化全球化打破封闭,社会整体性、资源共享性、发展协同性等已远非传统经济时代可比,经济实力、从事公益事业能力为现代公益事业发展



崔子研/文

资深公益人

提供了经济保障;现代公益的文化背景是文明和谐、平等友善、社会责任等成为价值取向,个人修行向家国情怀升华,命运共同体认识得到提升,热心公益成为时代风尚,文化促进成为现代公益发展的思想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公益和国家利益、人民

利益是一致的,公益事业有充分的政治保障。

传统慈善中的“仁”“爱”“德”等思想在现代公益中得以传承,现代公益为传统慈善的发扬开辟了更为宽阔的舞台,尽管在对象范围、组织方式、规模作用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